昆明学院学报　2017, 39(1):41~46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边疆治理研究】

近代云南海关《十年报告》述论

杨　梅
(云南省图书馆,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近代海关《十年报告》是海关出版物中史料价值较高的材料之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所在口岸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情况。了解海关《十年报告》的编纂缘起及编例,尤其是云南海关《十年报告》的基本情况,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特别是近代云南的经济、政治、交通、民生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关键词:近代;海关出版物;十年报告;云南海关
中图分类号:K29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1-0041-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1.007

On the *Decennial Reports* of Yunna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

YANG Mei
(Yunnan Provincial Librar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31)

Abstract: *Decennial Report*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 which fully describes the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s well 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orts and surrounding areas. The origins and events for the compilation, especially the general situations for the customs in Yunnan province, show the economy, politics, transportation and livelihood in modern China, especially modern Yunnan.

Key words: modern China; the publications of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 Yunnan customs

近代,中国海关实行的是外籍税务司制度。从1860年开始,我国海关就按照西方的管理和统计理念,建立起一套比较严格的申报、汇总、出版体系,出版了统计集(Statistical Series)、特集(Special Series)、杂集(Miscellaneous Series)、业务集(Service Series)、公署集(Office Series)和税务司集(Inspectorate Series)六大集海关出版物,其中规模最为庞大的是统计集,包含海关公报、年度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十年报告等内容。因此,海关出版物以其编制时间之长,内容之广泛,表达方法之科学、严谨,成为中国近代史最为系统、完整的资料。[1]

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汇编的京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的收录来看,近代云南海关出版物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年度贸易报告(Trade Report),二是年度贸易统计资料(Trade Returns),三是十年报告(Decennial Report)。笔者曾就海关出版物的经济史料价值及年度贸易报告撰写过专文进行论述,现再将近代云南海关的另一种类型《十年报告》的内容予以呈现,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一、编纂缘起及编例

自1882年起,由于对海关年报的内容和篇幅进行调整,各海关的年度报告被压缩到4页,仅简述口岸贸易情形。因此,1890年海关总税务司第524号通令要求各海关撰写《十年报告》,以弥补年度贸易报告在叙述各地社会发展情况等内容方面的不足。《十年报告》共编写了5期,其编写年限依次为:1882—1891年、1892—1901年、1902—1911年、1912—1921年、1922—1931年。其中,前4期《十年

收稿日期:2016-11-29
作者简介:杨梅(1969—),女(白族),云南大理人,研究馆员,博士,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云南地方文献研究。

报告》以英文本出版,第 5 期除英文本外,还专门出版了中文本,其题为《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

《十年报告》的编例在不同时期做过调整,其中前两期的主要内容有 26 项,可撰写至 30 页,包括:

(a)回顾 1881 年报告后十年间之形势,并对十年间各关所在口岸、所辖地区以及所在行省发生之要事均应发表评论。

(b)贸易方面之变化,不论流通供求,旧商品消失与新商品出现,连同贸易总值之增减,商品价格之任何急剧波动等均应陈述。

(c)税收之增减,包括总额、分类,或因特种商品引起之消长,均应标示清楚。

(d)洋药贸易形势,每年销售数量,不同品种洋药之价格,各类本土鸦片及其价格与产地,两者在供应方面在本地区本口岸之竞争程度,均应予以说明。

(e)货币行情,以兑换率应显示:(10)关平两各年兑换多少英镑,(20)关平两兑换多少当地货币。并表明在本口岸或本辖区或产地,关平两是否仍能购得往昔同等数量之本土产品及其变化。

(f)与其他通商口岸无关联之自开口岸,其到岸货物与离岸货物之价值应作出比较(按造册处税务司 1889 年报告中“贸易平衡”方法处理,亦即以进口货起岸时之货值减进口税及费用,出口货装船时之货值加出口税及费用)。

(g)本口岸在人口方面,包括华人洋人之人数、成分、身份或职业有否特殊变化。

(h)堤岸、道路、警察、街道照明等是否有何改进。

(i)邻近口岸水域中有无航道变浅、淤塞、加深,疏浚等方面之变化。

(j)各口岸辖区内有无灯塔、浮标、标桩等新置设助航设备。

(k)各口岸所在行省中有否怪异事故、流行瘟疫、台风、洪水、旱灾、暴动等任何不幸事件之记载,以及官方或私人为应付此等事件采取之重大步骤。

(l)曾否发生任何引人关注之大事,诸如显要人物来访及对其接待,其过程又如何。

(m)各省赴京参加殿试名列前茅者人数,并列出此一时期该省之状元、榜眼、探花姓名。

(n)各省曾否举办任何文学方面之专门活动,诸如公共图书馆之创办或翻修,文学会社之组成,为文学目的而进行之大额捐款或遗赠。

(o)各省可考选多少秀才与举人,文盲人数及其所占百分比,是否有受过一些教育之妇女。

(p)各省之一般自然特征,主要自然物产及其主要产业,通常用于运输者为挑夫、牲畜抑或船只。

(q)各关税务司所辖口岸之本国船舶总数,民船有多少种,每种民船之中文名称及民船从事贸易之性质,贸易口岸,其所持执照详情,船员人数,拥有之资本,航行之收益,损失百分率,以及民船是否有任何形式之本国保险。

(r)有何本国银行行号以及与何地往来,其费率及工作方式如何。

(s)有何本国邮政局所以及如何管理,信件发往及来自何地,如何并在何处交付邮资。

(t)各关税务司直属海关部门是否发生过较为特殊之情况,诸如规章之重大变更,所辖人员数量显著增加,工作量或工作部门之增加或增设。

(u)从国外观点视之,在各关税务司辖区之邻近地方,是否出现过陆海军,工业,财政或行政方面之特别事物。

(v)各口岸所在行省,有何种传教团体,以及传教士与皈依者之人数,等等。

(w)在各口岸有何省设有会馆以及各口岸在何省设有会馆,此类会馆或行会之规章以及会员之特权与义务,等等。

(x)在此期间有何著名官员曾在各口岸所在省任职或出自本省,等等。

(y)是否在此期间曾有任何著名之书籍在各口岸所在省出现,等等。

(z)当地在此期间之历史,或 1891 年末该地之状况与形势是否显示出该地将来之前景,等等。[2]

至 1911 年在编写第 3 期《十年报告》时,因前两期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信息,出于精简内容的考虑,对《十年报告》的篇幅进行了压缩,涉及的主题也有所减少,包括贸易和航业,关税,鸦片贸易,货币流通和财政,人口,邻近口岸的水路、港口,灯塔和助航设施,邮政和电报,行政和省议会,司法、警察和监狱,农业,矿产和矿业,制造业,铁路和公路,教育,市政和卫生进步、博物馆、医院,移民,物价和工资,饥荒或萧条与洪水、瘟疫、霍乱及其他流行病,陆军和海军的改变,国内出版发行等,共 21 项内容。[3]

至 1931 年在编写第 5 期《十年报告》时,除对既往百年的中国对外通商贸易作综合概述、编写了《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1832—1931)外,各口岸报告的编写体例和第 3、4 期大致相同。只是情况有所变化,在主题上稍作了修改,主要包括贸易、航业、关税、金融、农业、工业、矿业、交通、航行设施、地方行政、司法与公安、军事、卫生、教育、文艺、人口、治安等 17 项内容。[4]6-7

二、云南海关的《十年报告》

云南的三个海关——蒙自、思茅、腾越(今腾冲)的设立时间较晚于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所以编写的《十年报告》在时限和数量上并不完备。蒙自海关设立的第 3 年,即 1891 年开始编写《十年报告》,所以才成立 3 年的蒙自海关由税务司小哈珀(A. P. Happer, Jr.)撰写的是《蒙自报告,1889—91》。1901 年编写第 2 期《十年报告》时,思茅海关仅成立 5 年,撰写的是《思茅报告,1897—1901》。这两份报告的时限虽然都不满 10 年,但也归入了《十年报告》中。另外关于腾越海关的报告到编制第 3 期《十年报告》时才开始撰写。因此,云南三个海关的《十年报告》共有 12 份,分别是:《蒙自报告,1889—91》《蒙自十年报告,1892—1901》《思茅报告,1897—1901》《蒙自十年报告,1902—11》《思茅十年报告,1902—11》《腾越十年报告,1902—11》《蒙自十年报告(1912—21)》《思茅十年报告(1912—21)》《腾越十年报告(1912—21)》《蒙自十年报告(1922—31)》《思茅十年报告(1922—31)》《腾越十年报告(1922—31)》。另外,云南海关《十年报告》的英文篇目及作者见表 1:

表 1　云南海关《十年报告》的英文篇目和作者

序号	期数	篇 名	作 者
1	1	Mengtsz Report,1889 - 91	A. P. Happer, Jr.
2	2	Mengtsz Decennial Report,1892 - 1901	O. Tiberii
3	2	Szemao Report,1897 - 1901	A. Granzella
4	3	Mengtsz Decennial Report,1902 - 11	C. E. Tanant
5	3	Szemao Decennial Report,1902 - 11	F. Rospigliosi
6	3	Tengyueh Decennial Report,1902 - 11	E. B. Howell
7	4	Decennial Report,Mengtsz(1912 - 21)	A. G. Bethell
8	4	Decennial Report,Szemao(1912 - 21)	Angelo Casati
9	4	Decennial Report,Tengyueh(1912 - 21)	H. G. Fletcher
10	5	Decennial Report,Mengtsz(1922 - 31)	F. de P. M. P. Marti
11	5	Decennial Report,Szemao(1922 - 31)	Lee Peng Sheo
12	5	Decennial Report,Tengyueh(1922 - 31)	E. A. MacDonald

三、史料价值

旧中国海关《十年报告》所反映的 1882—1931 年的 50 年,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由传统封建文化向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过渡的转型时期,较之传统农业社会,这时期在思想意识、社会生活、风俗礼仪、工业生产等方面都发生着剧烈变化。从《十年报告》的编例上我们看出,其记述范围囊括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尤其注重新观念、新局面、新技术的出现,内容相当广泛,而且由于是根据调查资料或当时记载所编纂的,因此内容基本客观真实,资料性是非常强的。以 1931 年编制的第 5 期《十年报告》为例,除贸易和税收外,云南三个海关记录的内容还包括:

(一)金融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货币形态从未统一过,在主要使用纸币的民国时期,还存在着金属货币和外国货币。《十年报告》记载了海关所在地通行的货币及其变化、兑换情况,发行货币的银行或造币厂及其发行或铸造的币种等内容。如蒙自所用通行货币,一向是半元滇

币,到 1922 年左右逐渐稀少,大批纸币流通于市面。1923 年的海关税收也用纸币征收。1924 年,流通于市面的纸币达 1 200 万元,但价格却日益下跌。1926—1927 年,当局为整顿金融,收回 669.5 万元纸币予以焚毁,但价格仍难以提振。1931 年,流通市面的纸币仍有 7 000 余万元。此外,个旧锡务公司及个碧铁路局也发行钞票,可兑换富滇银行纸币。前者于 1928 年发行 250 万元,嗣经收回 150 万元;后者于 1918 年发行 200 万元,1926 年又增发 200 万元。这两个机构所发钞票曾经当局饬令收回。1930—1931 年,云南省当局又铸五角新币,但因含银量太小人民不乐于使用而无法在全省通行。市面所用辅币,有镍币与铜元两种。1 角镍币系 1923 年所铸,1927 年以前,每镍币 8 角 8 分半可换滇币 1 元,1931 年则每 5 角就可换 1 元;铜元有 1 分、2 分、5 分三种,皆镌唐继尧肖像。1927 年以前,每纸币 1 元可兑一分铜元 92 枚,1931 年仅能兑 30 枚。昆明有造币厂 1 所,每日可造 1 角镍币 4 000 元,半元银币 3 万元,1926—1931 年没有铸造铜元。[5]549

(二)农业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云南农业尚未脱离粗放式的管理经营模式,不知观测气候,不会预防虫害,也不进行土壤改良,诸如此类。但在农业、林业、畜牧业等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开办了农业试验场,引进了新技术、新品种,还倡导植树造林,滇南茶叶种植也发生了新变化。这些都反映在《十年报告》中。据记载,清宣统三年(1911 年)在距离昆明 15 里(7.5 km)的大堡子开辟农业试验场一处,采用抽水机、美国耕犁及其他新式农具从事试验。1922—1931 年又聘请外国技师为之指导。[5]549-550思茅一带,各种谷类均有出产,农民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不知采用新式机器。因为交通不便,收获的产品难以运到外地销售,加之主要产品大米的价格日渐下跌,销量疲滞。茶叶是思茅的名产,1912—1921 年之间,每年可产茶 35 000 担。1910 年以前,思茅迤南的漫乃、倚邦两地是产茶中心,品质最好,每年可产茶 10 000 余担。但在 1922—1931 年间,茶园遭到数次火灾,茶树焚毁,加之当地茶农死亡甚多,致使漫乃、倚邦两地的茶叶产量锐减过半。思茅西南的威远、缅宁、澜沧的茶叶产量却有所增加,仅威远、缅宁两地,1921 年产茶不过 9 000 担,1931 年已增加到 14 000 担。至于澜沧,前此数年尚无产茶之名,至 1931 年茶园范围日益扩大,每年也可产茶 1 000 担。[5]567-568在植树造林方面,政府定有专门规章,鼓励、帮扶植树造林,因而矿务公司、铁路局等都致力于植树。凡自愿在山间植树的,由公家拨给土地,所有种植树木,都无偿给予。农矿厅还另外供给树苗和种子,1931 年交给农民的树苗有 288 088 株,种子 275.29 担。[5]550

(三)工业

云南古代工业,除矿冶外,大致以衣食住行所需的日用品生产为主,主要是家庭手工生产。至近代,逐渐引进一些工业机器,从事规模化生产。《十年报告》对海关所在地及省会设立的工厂及生产、产品、员工、工资等方面情况都有所记载。例如,蒙自,1922 年建立纸烟厂,有日本制烟机 2 台,美国制烟机 1 台,上海及本地制造的机器数台。装烟纸盒则主要从上海输入。出品的纸烟有 6 种,每天可生产 10~20 万支香烟。雇佣有男工 33 人,女工 30~40 人,每天工作 8 小时,其中女工每装纸烟 7 盒(每盒 25 小包)给予滇省铜币 1 分。1927 年设立制皂厂,20%左右的原料靠进口,每天可生产 250 箱肥皂,每箱 100 块,分白、黄两种颜色。其中白色肥皂每箱售价关平银 3 两,黄色肥皂售价为 2.4 两,销量约占云南市场的九成。男性工人占九成,除供膳食外,工资每月关平银 3 至 5 两不等,年底还有额外奖金。1928 年开办玻璃厂,以西山沙子做原料,出品灯泡、花瓶等。此外,蒙自还有火柴厂、油厂、毛巾厂、织袜厂等,但无机器工厂,凡车床、刨床、引擎及舂米机器,都从昆明引进。另外,当地销售的电池也是昆明制造的。[5]550-551 而思茅的工业则数十年来毫无发展,纺织和制造银铁器具仍沿用旧法,没有变更。[5]568受交通掣肘,腾越的工业也不发达,仅土布织机稍有改良,产品比过去有所进步。1913 年设立的制革厂生产的皮鞋、马鞍等销售畅旺。[5]585

(四)交通

民国时期,云南的交通日趋进步,邮电、航路都有所改进,并逐渐引进现代交通工具,使人们享受到了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旅行之便。铁路和公路的建

设、运营,开展交通教育等情况,都在《十年报告》的记载之内。如 1922—1931 年间,滇越铁路用重铁轨重新铺设 40 公里(km),1931 年有 23 辆重机车往来行驶,所经山洞都有所扩展,并建设有桥梁 4 座,栈道 3 座,护水堤 24 段,车厂 2 处,车站 2 处,停车场 4 处,新增货车 212 辆。其中,河内与老街间每周开行夜车一次。公路方面,建设通车的公路达到 135 英里(217.26 km),包括昆明至杨林 40 英里(64.37 km),杨林延伸到东川 80 华里(40 km);昆明至曲靖 80 华里(40 km);昆明至禄丰 80 英里(128.74 km)。而在建设中的昆明经呈贡、昆阳到玉溪的公路行将竣工;蒙自至芷村的 10 英里(16.09 km)公路尚在建筑中;禄丰至大理的 338 英里(543.95 km)已经动工;昆明环城马路的 3 英里(4.82 km)已有数段落成通车。以上建成公路有客车 11 辆、长途汽车 4 辆、马达货车 19 辆、脚踏汽车 3 辆、拖动车 11 辆分别行驶。昆明曾于 1922 年设立航空学校一所,聘有广东籍机械师充任教员,学制为 2 年。1931 年,驾驶班有学生 50 人,机械班有学生 54 人,两班中有女生 12 人。当年还从东京购得飞机一架。昆明辟有飞机场,婆兮、文山、曲靖、楚雄、大理、蒙自等处均有分站。[5]554-555

(五)地方行政

关于地方行政方面的记载,反映省级或市级行政机构及其组织法、行政首脑及相关重要事件、行政经费使用占比、政区变化等情况,如反映 1913—1930 年西双版纳的行政管理变化的记载比较详细。1913 年,猛遮土司谋反,经督办边防各营柯树勋平定后,云南省当局即拟改土归流,裁撤土司,改设县长。但因车里宣慰及土司的反对,未能实现。继而柯树勋又拟《整理沿边意见书》,提出整理财政、发展工业、改良币制、设立学校、敷设邮电、填筑滩地、组织民团等十二条款,呈请云南当局,并得到批准。当年,柯氏即被委任为普思沿边八区行政总办,并将沿边更定为车里、勐遮、勐海、勐旺、勐腊、倚邦、普文、关房八县。柯氏就职后,在车里设署办公,裁汰杂税,化零为整,致使税收激增,贸易途径亦告恢复,商业得到发展,各地土司、头人的争斗也都得以平息。柯氏在职 14 年(1913—1927 年)间,沿边各地均有所发展,前途乐观,但柯氏骤逝后,由于继之无人,竟酿成九龙江之役。嗣后经普洱道尹徐为光敉平,徐氏遂建议取消行政总办,重将前设八县改定为车里、五福、佛海、镇越、象明、普文、芦山七县,而以原设之猛旺一县,改为临江行政委员辖区。这项建议并没有得到省府的采纳,但徐氏擅行变更,派委七县县长。而普文县由于人口过少,所筹经费不敷开销,及思茅辖境,划归他县,范围缩小。未久,徐为光被调往他处,普洱道尹空缺,亦被裁撤。1930 年 8 月 1 日,第二殖边局成立,以禄国藩为局长。禄氏呈请将前此徐为光所划七县改为车里、五福、六顺、佛海及镇越 5 县,前 4 县辖境一仍旧制,而将镇越扩展,包括像明县的一部分在内,而普文与象明二县均废止,并将其原辖地归并思茅、镇越两县。同时又将行政委员管辖的猛烈区改为江城县。这样,第二殖边局管辖区域,则较普洱道区范围缩小 9 县,而其行政职权亦随之削减,县长的任免权也不归其管辖了。[5]572-573

(六)卫生事业

关于卫生事业方面的记载,反映的是各地的医院、诊疗、流行病及防疫情况。如记载昆明设有英、法人开办的医院各 1 所,另有从事自营业务的西医 12 人。蒙自有规模较小的法国医院 1 所。河口、昭通、会理各有国人开办的医院 1 所。个旧原有 1 所法国人开办的医院,因经费缺乏,于 1924 年已经停办,由一位医生接办为私立医院。个旧锡务公司于 1928 年建立 1 所医院,至 1931 年尚有 3 位医生接诊。滇越铁路局聘有 2 位医生为该局职员诊疗。此外,个旧、开远、蒙自还有西医各 1 人。[5]557-558 腾越设有医院 2 所,公立、私立各一。私立医院名“东方医院”,是留日华籍医生所办,以妇科为主。公立医院名“广济医院”,由济善局办,院址在该局附近,经费由商会筹措,是一家慈善性质的医院。医院聘请华籍医生应诊,对贫穷者免费诊疗、用药,前往就诊的多数是穷人,富人鲜有光顾。[5]587 种痘在云南各地并不普及,省府昆明对种痘鲜有关注。蒙自种痘者似乎比个旧多,但个旧矿工在进入矿区前都要接种,以防天花传染。1925 年,河口流行天花,政府曾有强制性种痘的举措。1922 年,云南发生白喉及霍乱,4 月以前,染病死亡者竟达 4 万余人。1925 年,痢疾流行。1927 年,脑膜炎被发现。1928 年,昆明

天花蔓延。[5]558腾越对种痘尚知注意,而天花、瘟疫、霍乱等传染病却不多见。[5]588

(七)教育

20 世纪初,普洱府中学堂、云南省立高等学堂相继设立,成为云南近代教育的开端,且在办学宗旨、学制、官制、章程、课程、生源、组织管理等方面都与传统教育存在很大不同。《十年报告》提供了海关所在地的学校数量、学校的设立及裁撤、教授的课程、学费、教师工资等个案信息及总体情况。如记录腾越,有学校 135 所,计中学 1 所,男子高小 26 所、初小 92 所,女子高小 3 所、初小 13 所。中学授课科目有国文、英文、算术、党义、地理、动物、图画、公民、运动等,二、三年级学生加授理化及矿物学。女校课程有历史、地理、算术、公民、党义、刺绣、音乐、女训、家政等,但没有英文、动物各科,初级女校加授手工,中学则有国语一科,小学没有。中学学费每年为 6 元至 10 元不等,小学为 1 元到 5 元不等,主要按照学生家庭条件定其等第。腾越还有回族学校 7 所,《古兰经》为其必修科。[5]588

(八)出版发行

关于出版发行方面的记载,主要记录的是云南发行的报纸及印刷所的情况。如出版的日报都集中在昆明,省级日报有《云南民国日报》《均报》《西南日报》《云南晚报》《智明》《义声报》《云南新报》《社会新报》8 种;市级日报有《民生日报》《复旦日报》《大无畏报》,日销量各有 600 份左右。昆明有铅印局 3 所,其中 1 所为官营;有石印局多所。个旧原有印刷局 1 所,1927 年被土匪捣毁。[5]559腾越有印刷所 1 家,以印刷贺年片、名片、柬帖、商家广告等项为主,没有报章出版。1928 年以前,曾经试办过一份报纸,但很快因订户太少无法维继而停办。[5]589

除上述内容外,第 5 期《十年报告》还反映了抵制洋货、军事、人口、航业、矿业、邮政与电报、司法与公安、治安等诸多内容,限于篇幅限制,在此不一一叙述。

《十年报告》以海关所在地为中心,比较全面地反映该口岸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情况,所以反映的社会的面广而全,尤其在记录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社会进步、民生等方面积累了翔实资料。总税务司梅乐和因此自豪地说道:“历届报告,对于中国贸易、政治、交通、演变情形,均有详细记载,颇为中外人士所推重。”[4]5这些资料为我们了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目前,除第 5 期《十年报告》有中文本外,其他 4 期还是英文本,这给研究者的使用造成较大障碍,还有待翻译、出版。

[参考文献]

[1]吴松弟,方书生. 一座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资料宝库:中国旧海关系列出版物评述[J]. 史学月刊,2005(3):83 - 92.

[2]黄胜强. 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一卷[M]. 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329 - 331.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 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 156 册[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5 - 6.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 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 157 册[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 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 158 册[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